

在史诗化追求中形塑现代英雄人格精神

——长篇小说《红日》再解读

陈夫龙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红日》以宏大叙事的史诗化追求和现代英雄人格精神的形塑与坚守独异于当代文坛,不仅熔铸着作家吴强的政治忠诚和艺术真诚,而且体现了他高远的价值理想和深沉的家国情怀。“红日”作为一种精神象征照耀着沂蒙大地,不断丰富着既具传统文化底蕴又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沂蒙精神,日益充实着山东乃至全国的红色基因图谱的建构。《红日》的成功不仅在于它以宏大叙事结构再现了一支英勇的人民军队辗转千里、驰骋疆场的征战过程,还在于它形塑了一种现代英雄人格精神,使小说成为以英雄为核心形象的一曲英雄主义颂歌。

[关键词]《红日》;史诗化;价值选择;现代英雄人格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23)04-0036-08

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23.04.005

引言

《红日》是作家吴强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于1957年7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一经问世,便在全国读者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震撼了中国当代文坛。1960年由吴强、瞿白音改编的电影剧本发表^①,1963年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摄制完成并在全国公映,更是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发挥了巨大的教育功能。《红日》还被翻译成英、法、俄、日、德等多国文字在海外传播,成为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典范之作。小说讲述的主要是发生在沂蒙大地上的革命战争故事,文本深处洋溢着革命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宏大叙事结构和日常生活描摹交叉推进过程中,深情颂赞了人民军队的战斗豪情和沂蒙人民的支前奉献精神。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至今传唱不衰,歌词中“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一阵阵歌声随风传”“弯弯的河水流不尽”“高高的松柏万年青”“绿油油的果树满山冈”“望不尽的麦浪闪金光”^②等一个个具有鲜明沂蒙地域特色的意象浑然交融,组成了一幅优美壮观的画卷,其中灌注着对故土家乡和解放军的热爱之情、捍卫胜利成果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自问世六十多年来,这轮熔铸着作家政治忠诚和艺术真诚的“红日”以其宏大叙事的史诗化追求和现代英雄人格精神的形塑与坚守独异于当代文坛,虽饱经磨难,但愈益生辉,在小说和电影、电视剧等各种艺术形式构筑的张力结构中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并作为一种精神象征照耀着沂蒙大地,不断丰富着既具传统文化底蕴又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沂蒙精神,日益充实着山东乃至全国的红色基因图谱的建构,当之无愧地进入当代文学“红色经典”序列。

《红日》出版后,研究者大都从社会历史批评的原则标准出发,主要集中于对作品思想内涵的阐释和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抗战文学与侠文化研究”(批准号:19YJA751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夫龙(1975—),男,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①吴强,瞿白音:《红日》,《电影艺术》1960年第12期。

^②吕其明,杨庶正,肖培珩:《谁不说俺家乡好——故事片〈红日〉插曲》,《北方音乐》,2006年第10期。

艺术成就的肯定,指出其以色彩斑斓的历史图卷反映了“革命战争史诗当中的壮丽的一章”^①,堪称“气魄宏伟的革命史诗”^②。“文革”期间,《红日》被诬蔑为“大毒草”受到批判,罪名之一即为宣扬战争恐怖,反面人物张灵甫形象塑造得过于光辉。新时期以来,《红日》被恢复名誉,受到公正的评价。有论者指出其艺术生命力“主要由于作者着眼于战争中的人,通过比较宏大的规模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揭示人物的心灵世界,成功或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艺术形象”,尤其可贵的是,该论者认为“真实、深刻地塑造敌军将领的形象,是《红日》的一个突出成就”^③。在“红色经典”再解读热潮中,现代性、叙事学、文化研究等角度或方法的引入,丰富了作品研究的理论视域,的确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提升了《红日》的研究层级,拓展了其研究格局,但从整体上看,仍未处理好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及与此相关的人物形象塑造问题。基于此,本文力图从“政治与文学之间的价值选择”和“现代英雄人格精神的形塑与坚守”两个层面,完成对《红日》的再解读,希望对《红日》研究能有新的推进。

一、忠诚与真诚:政治与文学之间的价值选择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其发生的独特语境。作为十七年革命战争历史小说的代表作,《红日》正是在文学为政治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特定时代语境中孕育生成的,在宏大叙事的史诗化追求中,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政治意识形态规训的印痕。

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学发展的路径仍然遵循着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范的工农兵方向和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创作原则。工农兵文学的方向和规范是毛泽东战时文化策略的构成要素,文艺被纳入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工具的范畴,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具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要达到这种目的,必然要求文艺家必须无条件地加强自我改造,从政治立场到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上实现彻底的转变。可以说,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革命战争题材小说大都是作家实现了这种转变的结果。不可否认,这类小说所塑造的农民在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暗合甚至迎合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建构的一种政治立场鲜明的话语言说系统,符合党的领袖毛泽东重视人民群众力量的政治观和价值观。在战争年代,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结束灾难深重的战争生活,毛泽东对文艺提出这种硬性的政治要求既符合历史逻辑,又具有时代合理性。

当然,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文艺政策理应作出相应的调整,但当战时文艺政策尤其是文艺的政治功利性并未得以调整反而日益被强化时,就会出现文艺沦为政治附庸的可能,不利于文学生产力的解放及其多元美学形态并存发展,也不利于文学精神的自由。这就势必会造成当代作家在政治与文学之间价值选择的尴尬甚至无所适从。对于作家吴强而言,同样面临着这种选择的两难。

作为从战争年代走进新中国的革命作家,少年时代的吴强接受过五四新思潮的影响;1933年2月加入左联开始革命文学生涯,卢沟桥事变后,以笔为剑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的洪流之中;1938年毅然投笔从戎,赴皖南参加新四军,1939年10月入党,曾任新四军政治部文艺干事、科长等职务,基本上完成了由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转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苏中军区政治部宣教部副部长、华东野战军六纵宣教部部长、十兵团宣教部部长等职务,并亲身参加了涟水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等。从他的简历中,可以发现,战争年代的吴强是在党的教育和引导下逐渐走上革命道路的,是党的文艺战线和政治宣传战线上的忠诚战士。在政治上,吴强忠诚于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在创作上,深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影响。据作者回忆,1946年,他所在的部队在第二次涟水战役中败给国民党精锐部队整编第七十四师。当时“许多干部、战士和地方群众,给他们的炮火枪弹打

①冯牧:《革命的战歌,英雄的颂歌——略论〈红日〉的成就及其弱点》,《文艺报》,1958年第21期。

②罗荪:《评〈红日〉》,《收获》,1958年第3期。

③潘旭澜:《〈红日〉艺术成就论辩》,《文学评论》,1982年第6期。

死打伤;我军上下,谁不万分愤慨,满怀仇恨。在那个天色昏暗的下午,我正和另一个同志骑着马,朝涟水城的北门奔跑,去火线上传达军首长的战斗指示,迎头碰到几个战士,他们浑身泥土,有的负了轻伤,头上、臂上扎着绷带,有的倒背着步枪,从火线上来”^①。这是残酷的战争让作者看到的真实的一幕,这种暗夜前如血残阳般的战斗场景沉潜于作者的创作意识深处,等待胜利朝晖喷薄而出的黎明时分的到来。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就号召作家:“假如说在全国战争正在剧烈进行的时候,有资格记录这个伟大战争场面的作者,今天也许还在火线上战斗,他还顾不上写,那末,现在正是时候了,全中国人民迫切地希望看到描写这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的伟大作品!它们将要不但写出指战员的勇敢,而且要写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战术思想,要写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这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艺术的记载。”^②新中国成立后,吴强转业到地方做专业作家。长期的深入思考和刻骨铭心的战争体验一直推动着他想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生命体验写一部作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艺术的记载”的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在他看来,“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都是战争艺术中的精品、杰作,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在这两个艺术品上焕发着耀目的光华色泽。就是我军受了挫折的涟水战役,到后来,也起了成功之母的积极作用。我珍爱它们,我觉得文学有义务表现它们”^③。但由于种种原因,吴强迟迟没有动笔。作为革命军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写出一部英雄史诗责无旁贷,对他而言,不仅是一种义务,更是一项神圣使命,从而秉持鲜明的政治立场自觉地以一种饮水思源的情感,深情缅怀过去艰难的岁月、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讴歌革命先烈的和人民军队的丰功伟绩,以小说的形式为既往的革命历史提供一个合法化与合理化的文学话语支撑。而作为作家,他又总是遵循内心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和诚挚体验,不想让生活真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艺术真实的书写中淹没于宏大叙事的统一规范,而陷入本质真实的窠臼。在这里,本质真实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性同艺术真实和艺术创作的自主性发生了冲突,小说文本在宏大战争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交织推进的节奏中形成了一种叙事的复调。作者讲道:“涟水是我的家乡,涟水一仗之后,我的家乡,处在敌人的践踏之下,因而对敌人七十四师有着更加具体的憎恨,对我捕捉这个题材,在思想里酝酿和构成这个故事也是一个小小的虽然是并不重要的因素。虽然我对参加过的战斗,都有感受,也都觉得那些战斗的历程,是客观存在的生动的故事,有些战役在某种意义上,比消灭七十四师的孟良崮战役更有特色,我也很想写写那些故事,但我却没有首先去写那些故事,而首先写了从涟水战役到孟良崮战役的这个故事。其主要原因,我觉得,就是这个由许多人物活动而组成的战争故事,在我的心里有着比其他战役更多、更深刻也更真切的感觉,因而激起了表现它的比较强烈的思想冲动。就是说,《红日》的题材的选取和故事的形成,并非单是由于题材的客观意义和战争史实的富有艺术性,而是客观现实和我主观上的思想情感自然结合的成果。”^④这就意味着作者并未完全从当时的政治规训和意识形态要求出发去组织题材,而是在艺术真诚的召唤下尊重生活真实的样子去描摹生活、反映战争真实的状态,书写鲜活的人性人情,即使是反面人物,作者也赋予其独立的人格与地位,给予真实的人性化描写,把他们当作活人,深入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这就突破了当时脸谱化、概念化的普遍做法。如小说对张灵甫和张小甫等反面人物的塑造,这在当时的小说创作中实属罕见。从而使《红日》在十七年长篇小说史诗化追求的整体宏大叙事架构下涌现出一股来自大地深处的清纯朴素的叙述清流。

吴强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亲身经历且亲眼目睹过战争的残酷、血腥和穷苦百姓身陷战争苦难的痛苦与挣扎,他的创作来自他的战争经历和战争体验。身处新时代和新社会的自豪感,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党和领袖的感激和歌颂,这种种复杂交织的情感凝聚为一种政治的忠诚并化为创作的动力,满溢着为新中国建设发掘精神资源的责任和激情。创作需要冷静和理性,这就要求作者秉持艺术真

^{①④}吴强:《写作〈红日〉的情况和一些体会》,《吴强文集》(第3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462-463页,第464-465页。

^②周扬:《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29页。

^③吴强:《修订本序言》,《红日》,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诚、遵循小说创作的美学规律去描摹生活真实揭示历史本质,通过特定时代环境描写和社会气氛渲染,来凸显具有时代普遍性和现实意义的人们的精神面貌与生活情趣。作者力求沉静下去,在历史语境中客观地叙写战争、真诚地塑造战争中的人,但强烈的对民族国家和人民军队的热爱,使他的创作激情无法在小说情节的铺展和宏大叙事中沉静下来,从而形成小说昂扬向上的基调。

小说《红日》以华东野战军沈振新军的活动为中心,描写了陈毅、粟裕等华野领导如何根据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战略决策与作战部署,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从而粉碎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毛泽东军事战略的最拿手的方法就是善于抓住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红日》从沈振新军在第二次涟水战役失败写起,从苏北战场实行战略转移,跨过陇海线深入山东解放区,继而在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生动形象地诠释了毛泽东这一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正确性。尤其是在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精锐王牌部队——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刚愎自用、骄傲轻敌,冒然孤军深入孟良崮腹地。华东野战军首长及时抓住时机,集中优势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包围,经过三天激战,最终全歼了这支号称蒋介石“五大主力”之首的御林军。小说的叙事视点聚焦于沈振新军,真实书写了这支英雄的人民军队由涟水受挫到莱芜再试锋芒直到孟良崮奋然崛起的心路历程,映射出整个山东战场的发展态势,达到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思想如何在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这两个人民战争艺术精品上熠熠生辉的创作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红日》反映的、表现的,是以陈毅同志为主要指挥员的华东野战军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军事路线的光辉胜利,是陈毅同志和其它华东野战军的领导同志将毛主席军事思想付诸战争实践的光辉胜利”^①。小说不仅塑造了军长、师长等高级指挥员形象,也写了团、营、连、排、班等基层指挥员和普通战士以及解放区人民群众;不仅写了前线,也写了后方;不仅写了战争场面,也写了日常生活场景。在这个立体复杂的叙事结构中,通过写战士们英勇顽强的战斗和人民群众对军队的鼎力支持与无私奉献,既艺术地演绎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诠释了人民群众是历史进步推动力量的唯物史观,又力图告诉人们,解放区军民团结斗争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正是源于对党和毛泽东的崇敬和爱戴。小说中那个患肺结核病的地委书记龙泽在知道新的战役即将打响时坚定地表示拼命也要支持正义战争,最后他为支援前线辛劳过度而壮烈牺牲了。还有葛成富、葛老大娘、张老大娘、余老大娘、活捉五个俘虏的张家峪的八个妇女、开赴前线的民兵等,他们都在无私地为革命做着贡献。正是人民解放军和这些沂蒙大地的普通百姓“忘我”的奉献牺牲精神,进一步夯实了沂蒙精神的底蕴。

同样是战争题材的作品,但《红日》并未像《保卫延安》那样,“把英雄人生的全部意义只归结到战争上去,而是在战争之外,还写出了英雄人生的其他要义,凸现了情感在人生中的价值和意义”^②。深入文本深层,《红日》中存在着两条基本的情感线索,一是人民解放军和支前群众对祖国、对党和人民最深沉的爱,一是部队上下级之间和战友之间的深情厚谊。这是属于战斗生活中的情感,但作者并未局限于此,而是在文本中间穿插了对战争中爱情生活的描写,具体体现为军长沈振新和妻子黎青、副军长梁波和华静、机要员姚月琴和胡克、班长杨军与妻子钱阿菊的爱情故事,写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微波细澜。前二者因为发生在人民军队的高级指挥员身上,所以在现代革命战争历史小说中尤其引人注目;后二者作者倾注了不少笔墨进行生动地描绘渲染,从而使小说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场景中氤氲着温馨幸福和似水柔情。这些爱情画面的细腻描摹和感人叙述,与战争的暴力血腥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描写和叙述行为与当时主流战争观念虽然存在一定的疏离,但其本身在文本中形成了一种召唤,那就是对和平安宁生活和健康美好人性的向往与追求。这成为浴血奋战的战斗场景之外感人的亮点,体现了作者力求比较客观全面表现战争时期生活的艺术理想。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社会崇尚英雄、歌颂人民革命战争的时代大潮中,硝烟弥漫的战争背景下描写爱情的温馨,体现出一种人情味和人性的闪光,显得难能可贵。

①吴强:《谈〈红日〉的创作体会》,《文学评论》,1978年第3期。

②朱德发等:《现代中国文学英雄叙事论稿》,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页。

可以说,《红日》通过许多非战争的现实日常生活场景如医院、后方的真实描写,既反衬出现代战争的残酷无情,又为战争描述增添了栩栩如生的景外画面。它不仅以艺术上适度的节奏来缓冲战争生活带给人们阅读体验上激烈紧张的情绪;而且以爱情生活的细腻描摹和娓娓叙述来激发人们对和平安宁生活的向往和对战争中美好人性的深情呼唤。从而使《红日》呈现出与同时代其他革命战争题材小说不同的风貌,还对后世的有关创作产生了深刻启示和深远影响。当然,这与吴强以政治忠诚开始、以艺术真诚贯彻创作始终的价值选择是分不开的。

二、革命与侠义:现代英雄人格精神的形塑与坚守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英雄民族,英雄理念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崇拜英雄、崇尚英雄主义或许是人类的固有无本性之一,因此英雄豪杰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文学作品中出现频率之高是无与伦比的”^①。塑造英雄人物、形塑英雄人格精神成为全人类文学当然也是中国文学的闪光点。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话语主导下,文学领域中的确塑造了一系列革命英雄形象,如杨子荣、少剑波、刘洪、王强、沈振新、石东根、杨晓冬、朱老忠、梁永生、桥隆飙、柳八爷等,他们早已作为英雄象征符号进入了红色经典的人物画廊。这些革命英雄大都承传了中国侠文化传统,扶危济困、英勇无畏、义薄云天、视死如归。为政治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红色经典中的革命英雄形象,与出身底层、除暴安良、救人于厄、伸张正义的侠客具有先天的一致性。但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红色经典中的这些革命英雄形象与以武犯禁、肆意陈欲的侠客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那就是侠客秉持内心的正义观念凭一己之力舍己助人、慷慨赴难,革命英雄形象则都在党的引导、教育和改造之下褪尽草莽江湖气而逐渐走上革命道路,成为革命的有生力量,文本中激扬着一种侠义英雄理念。侠义英雄理念及其文化基因源于墨家学说,远古时代就有尚武任侠之风,但将侠之赖力自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②的自我牺牲精神加以文化表述的是墨家学说。墨家指出:“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③在行为上则“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④。言行上都体现出一种视死如归、赴汤蹈火的侠义英雄气魄。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儒墨并举的局面彻底打破,墨学已成庙堂绝学而销声匿迹,但其文化基因滋养下的侠文化却以反正统的形态在民间社会潜滋暗长、生生不息,侠义精神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积淀获得广泛的存在领域,逐渐形成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形塑着人们的思想、人格和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十七年和“文革”时期革命英雄形象的集结式出现,体现了新中国作家在阶级斗争语境下对革命侠义精神的再造与重铸。在他们精心营构的革命英雄叙事文本中,其显形结构力图适应阶级斗争的时代主题,深情叙述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的进程,大力表现革命者的英雄主义精神,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其隐形结构迎合大众审美趣味,借鉴汲取侠文化和民间英雄传奇的积极要素,并对之进行了符合政治革命和阶级斗争话语需要的改造、转化、利用,使之成为文本肌理的有机质素。这就使得革命英雄叙事文本因双重结构的相得益彰而充溢着革命侠义豪情和浪漫传奇色彩,从而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风貌。

具体到小说《红日》,作者把真实的战争历史(1946年秋末冬初至1947年5月的涟水战役和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与艺术虚构相结合,游走于革命和侠义之间,在侠义英雄理念的制导下,精心塑造了沈振新、丁元善、梁波、刘胜、石东根、杨军、秦守本、张华峰、王茂生、安兆丰、张德来等呼之欲出的英雄人物,即使像黎青、华静、姚月琴和钱阿菊等弱女子,也体现出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侠义情怀和英雄精神。通过塑造革命英雄形象,揭示正义之师的力量源泉,体现出作者对现代英雄人格精神的形塑与坚守。吴强着力塑造战争英雄个体,意在表现党的领导、思想政治工作和阶级感情等对英雄成长的重要作用,揭

①陈颖:《中国英雄侠义小说通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②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五·非攻下第十九》,《诸子集成》(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8页。

③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十·经上第四十》,《诸子集成》(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2页。

④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十·经说上第四十二》,《诸子集成》(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4页。

示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和积极配合与战争胜利的必然关系。这样一来,“传统小说中侠客的那种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随意自在行为,被赋予了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全新政治理念”^①。因此,小说传达的是革命英雄理念、高奏的是革命英雄主义的豪迈战歌,给予读者崇高的艺术感受和悲壮的精神洗礼。

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战士主要来源于农民,他们参加革命队伍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自己以及和自己一样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战,他们绝非一群放下锄头拿起了枪杆的普通农民,而是在革命思想教育、改造、引导和规范下走上反抗之路的拿枪的农民,他们的政治觉悟使他们逐渐摆脱了散兵游勇的非革命气息,在集体主义思想指导和培育下,不断朝向政治文化的方向发展,成长为一种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复兴而不懈奋斗的新型的国家建设力量。在通往这种解放他者和实现自我解放的道路上,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英雄人格精神恰恰是我们的民族进步和国家发展所迫切需要的。早在清末民初,以梁启超、鲁迅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着力于国民性的研究和批判,积极发掘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因子,试图激活日益衰弱的国民精神,这种国民精神结构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可以称之为英雄人格精神。无论是梁启超呼唤的尚武任侠精神,还是鲁迅赞誉的民族的脊梁精神,其中都内蕴着一种九死不悔的现代英雄人格精神的期待与建构。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手握枪杆子被武装起来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逐渐走上革命道路,不断成长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进步力量。《红日》在规模宏大且残酷激烈的战争描写中成功塑造的出身农民的一批解放军指战员构成了一个伟大、崇高、集体的英雄群像。在作者笔下,英雄们不仅是只会持枪杀敌的勇士,也不只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英勇无畏的指挥员,而且都是个性鲜明、有着丰富的人性人情的普通人。小说除了表现他们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崇高境界之外,还写了婚姻家庭、儿女情长、悲欢离合、阶级友爱等日常生活,多层次全方位客观地描写了人性人情之美,战争与爱情、英雄与人性、战场与后方、残酷与温情错综交织、交相辉映,构成了一曲别有意味的英雄乐章,而每一个革命英雄形象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音符。

《红日》以军一级高级指挥员为作品的中心人物,对军长沈振新和副军长梁波的形象塑造非常成功,不但写出了他们对战争全局的运筹帷幄,而且表现了他们思想情感深处的细微变化,并触及他们婚姻爱情生活。沈振新冷静沉着、坚毅果敢、热情豪爽,有一种气宇轩昂的逼人的英武气概,但在第二次涟水战役失败后却又显得焦躁不安。梁波乐观开朗、幽默风趣,看似松散,实则深谋远虑、机智过人。他们不但有着英雄人格精神和独特的个性,而且又有普通人共有的人性人情和缺点不足,这就使得高大伟岸的英雄形象有血有肉、更接地气。团长刘胜和连长石东根是在战争的考验中逐渐成长起来的英雄,吴强认为:“透过这些血火斗争的史迹,描写、雕塑人物,既可以有所依托,又能够同时得到两个效果:写了光彩的战斗历程,又写了人物。看来,我不是写战史,却又写了战史,写了战史,但又不是写战史。战史仿佛是作品的基地似的,作品的许多具体内容、情节、人物活动,是在这个基地上建树、生长起来的。”^②由此可见,写战史不是作者的唯一目的,在小说中表现人物的成长更加重要。刘胜、石东根等出身农民,他们身上具有小农意识及其个性弱点,作者没有刻意回避他们身上的这些局限。因此在作者笔下,他们革命立场坚定、对党和军队无比忠诚,为革命事业奋不顾身,勇敢善战,也具有民间草莽英雄的习气。如刘胜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团政委陈坚存在偏见,且时间观念淡薄;石东根办事急躁,不讲战术,有游击习气和军阀残余作风,尤其是在莱芜战役胜利后醉酒纵马事件将造反农民的某种特性展露无遗。但这丝毫不影响英雄形象的建构,反而显得真实可信,体现了英雄成长的过程。在孟良崮战役中,团长刘胜于关键时刻作出英明决策,及时挽救了我军危险的战斗局面。他在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情况下,仍时刻关注前线的局势,他那种蔑视、仇视敌人的英雄气概深深地激动着政委陈坚的心。临终前,刘胜不仅挂念战争局势,而且关心着亲人和战友,他拿出手表、钢笔和苏维埃银行票券等三样物品掷给警卫员让他交给组织部,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忠诚、无私无畏的精神。在接受了军长沈振新的批评后,石东

^① 宋剑华:《百年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页。

^② 吴强:《修订本序言》,《红日》,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根为了让党和首长放心,硬是铁着心坚决地戒了酒;在战斗中总是临危不惧、身先士卒,在仰头上攻的紧急关头,他一脚悬空,一脚踏上悬崖的石齿,左手紧攀石缝中长出来的一棵小柏树,右手持枪向居高临下的敌人射击,即使头发被烧、衣服着火,也毫无顾忌,依然更顽强地继续战斗,这个具有江湖侠客气质的莽汉终于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英雄。战斗英雄杨军并未沉浸在千里寻夫、美丽善良的妻子的温柔乡,伤愈后执意再上战场奋勇杀敌,在孟良崮战役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机要员姚月琴为了坚守在前线而不接受到后方去工作的命令,为了能参加战斗而拒绝爱情,求战心切、焦虑战事使她无心谈情说爱,想等战争结束后再谈感情问题,一副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形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战士梅福如,他一出场就在后方医院里,往往为研究者所忽视。梅福如十三岁的时候,妈妈被蒋介石军队的一个军官拐跑,父亲被他们毒死。他的生活开始陷入困顿和悲惨境况,后来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他才真正快活起来,只是将悲酸苦痛埋在心底。梅福如在部队中成为团部炮兵连小炮排的一个六〇炮手,左脚受重伤给锯掉了。他能说会唱,人送艺名“腊梅花”。他读过很多武侠小说,为人豪爽,爱做好事,重情重义。他“那种豪爽、侠义的气概,充满着良心自慰的得意的神情,使得每个人不但觉得好笑,而且不能不衷心地钦佩他”^①。在杨军重返部队之前,是他促成钱阿菊认余老大娘为干娘,重吃交杯酒,使两个破碎的家庭重组为一个战火中的新家。在杨军眼里,这个炮兵连的伤员,不但可爱可敬,而且他所特有的英雄气概、活跃的生命力和对敌人的刻骨仇恨与蔑视、鄙视,使他成为一个鲜明的塑像:“他是永远不会被敌人屈服的钢一样坚强的人物。”^②就是这样失去一只脚的坚强的战士,他仍希望能装上一只假脚重返战场杀敌。在《红日》中,英雄作为一个群像是崇高的、坚强不屈的。这个由军首长、指挥员、英雄战士和英勇的支前群众熔铸的群像,“屹立在巍然独立的沂蒙山孟良崮峰巅的最高处,睁大着他们鹰一样的光亮闪闪的眼睛,俯瞰着群山四野,构成了一个伟大的、崇高的、集体的英雄形象”^③。作为群体形象,他们在战场上为了集体利益而重义轻生、视死如归,他们的牺牲是为了换取更大的胜利;作为个体形象,他们血肉丰满、个性鲜明,充满了人性美和人情美。

吴强坦言:“我感激我们的党,领导了胜利的革命战争,又给了我通过文学形式再现战争生活的机会和条件,并且在我写作过程中,殷切地母亲般地关心我,经常地给我既原则又具体的种种指点。我感激打败了强敌的那些革命的人民、人民战士和勇敢的、高尚的、忠诚于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英雄,像沈振新、丁元善、梁波、刘胜、石东根、杨军、秦守本、张华峰、王茂生、安兆丰、张德来……华静、黎青、姚月琴、钱阿菊、葛老大娘、张老大娘、阿菊的干娘余老大娘,等等。他们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创造了辉煌胜利,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们在生活里感动过我,以他们的卓越的行为、品德影响过我,而又被我当作了书里的主人公和写作对象。”^④作为革命战争“史诗”的艺术载体,《红日》的成功不仅在于它以宏大叙事结构再现了一支英勇的人民军队辗转千里、驰骋疆场的征战过程,还在于写出了一群革命英雄的音容笑貌和“日常生活”,形塑并坚守着一种现代英雄人格精神。从而使小说成为以英雄为核心形象的一曲英雄主义颂歌,通过追忆历史表达对英雄人物所创造的英雄业绩的深情缅怀和无限崇敬。

结 语

吴强以战争参加者的身份深情地缅怀革命历史,以胜利者的姿态通过小说的方式重新书写历史,积极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承担起谱写现代革命英雄史诗的重任。战争造就了残酷与血污、苦难和创伤,但也形塑了美德和真情、人性和品格、良知和正义。这些美好品德的核心要素凝聚为一种现代英雄人格精神,这主要通过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体现出来,“革命战争中的英雄人物的塑造不仅是在描绘一群特定的人物生存状态,而且是在描绘一群建立国家现代化的主体的精神风貌和风采”^⑤。追忆历史是为了

^{①②③}吴强:《红日》,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310页,第312页,第541页。

^④吴强:《修订本序言》,《红日》,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⑤蓝爱国:《解构十七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书写当下,书写当下是为了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实现崇高而远大的革命理想。作者直言:“看到美好的今天,瞭望更美好的明天,我不禁想起了在风里、雨里、炮火纷飞里苦战恶斗的昨天,更不禁想起了那些勇敢的、忠诚于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英雄战士。”^①作者如此坦诚,无非是要告诉世人,他对于革命战争历史的追忆和颂赞,更多的是出于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他对这段革命战争历史的纪实性书写,旨在激励后人、教育后人珍惜来之不易的现实生活;他对于现代英雄人格精神的形塑,目的在于既要传承一种光荣的传统,更要以此作为重要的精神资源致力于新中国的建设。因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不仅给工农大众带来了无限生机和无比欣喜,更让他们看到了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的一线曙光。作为一位革命文艺工作者,吴强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他以自己的政治忠诚和艺术真诚书写的《红日》体现了高远的价值理想和深沉的家国情怀。

尽管早在1965年夏天,《红日》就被扣上了“和平主义”“修正主义”“自然主义”三顶黑帽子,之后又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特大毒草”。但“因为她是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引导之下,是在毛主席的伟大红旗的招展之下出生问世的;因为她受到我所敬爱的陈毅同志等的亲切关怀;因为她为许多读者所喜爱”^②;所以《红日》并未在历史的厄运中夭折,反而以其崇高的思想内涵和独到的艺术成就在时代变迁中显示出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并日益焕发出应有的精神风采。《红日》堪称20世纪50年代“继《保卫延安》之后我国军事题材创作的又一个重大成就,并且至今仍然是我们文学在这个领域所达到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③;“说它是中国现代战争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并非溢美之辞”^④。作为长篇小说精品力作和描绘解放战争历史画卷的红色经典,《红日》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这意味着主流话语和人民群众对它的双重肯定。作者吴强不是山东人,但他曾战斗生活在沂蒙大地,尤其是他的这部长篇小说处女作使他与山东、与沂蒙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孟良崮因《红日》而成为人民解放战争的精神地标,沂蒙大地因《红日》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而不断丰富着中国红色基因图谱建构的意义版图。“红日”照耀沂蒙,新时代沂蒙精神的内涵将历久弥新,并日益丰厚深广。

[责任编辑:曹振华]

①吴强:《修订本序言》,《红日》,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②吴强:《谈〈红日〉的创作体会》,《文学评论》,1978年第3期。

③潘旭澜:《〈红日〉艺术成就论辩》,《文学评论》,1982年第6期。

④宋炳辉:《论〈红日〉》,《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Main Abstracts

The value implication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new era

Jing Huilan Zou Lu(5)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houlder important historical task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realizing the historic caus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In the new era,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also the essential embodiment of the Party's nature and purpose.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leading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the CPC has constantly explored ways and means to strengthen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ove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s been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To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Party's core leadership position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y improv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talent team,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deepening the democratic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n the basis of profound learning from historical experience.

Shaping the spirit of modern heroic personality in the pursuit of epic

—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novel *Red Sun*

Chen Fulong(36)

Red Sun is different from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world in its epic pursuit of grand narrative and the shaping and persistence of the spirit of modern heroic personality. It not only forges the political loyalty and the artistic sincerity of the writer Wu Qiang, but also reflects his lofty value ideal and deep feelings of family and country. As a spiritual symbol, the red sun shines on the land of Yimeng. It constantly enriches the Yimeng Spirit with both traditional cultural deposits and distinctiv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creasingly reinforc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d gene map in Shandong and even the whole country. The success of *Red Sun* lies not only in its grand narrative structure, which represents the process of a heroic people's army traveling thousands of miles and galloping on the battlefield, but also in its shaping of a modern spirit of heroic personality, making the novel a heroic anthem with heroes as the core image.

Research on the operation positioning of county-level convergence media center embedded in governance system

Yi Xuming(65)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 socialism modernization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s governance is a new model of modernization that combines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wisdom and forms a balance between state authority, social consensus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Modern governance requires the mainstream media at the county level to explore and upgrade the positioning from the propaganda mouthpiece to the governance assistant. Its value orientation is to spread the fundamental value, authoritative policy, service information, and absorb public opinion interaction. Its relationship is positioned to provide information connection services for the governance department, form technical nested cooperation with the superior media, and connect the governance objects through the social media matrix. Its product positioning focuses on local people's livelihood social news, local policy news, as well as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and political inquiry services, consumer complaints services. This kind of media governance based on multi-dimensional new connection in digital space is not only a tool rational governance method, but also the value rational essence of people's supremacy and consultative democracy.

Hegel and the "quarrel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on dialectics

— An academic reflection based on Gadamer's *Hegel's Dialectics*

Fu Yongjun Song Kaicheng(91)

Hegel treated the "Quarrel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Moderns" in dialectics a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Moderns". Through comparison of differences,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he integrated the